

贸易增长、劳动力市场 刚性与产业间劳动力转移

——基于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余官胜*

摘要：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存在是决定国际贸易能否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现有的实证研究却忽视了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决定性作用。本文基于国外文献的度量方法构建劳动力市场刚性和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并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当劳动力市场刚性存在差异时贸易增长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低于门槛值时，贸易增长能加速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而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高于门槛值时，贸易增长则会阻碍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由此得出结论，欲使中国的贸易增长起到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效果，必须先劳动力市场领域进行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刚性。

关键词：贸易增长 劳动力市场刚性 产业间劳动力转移 门槛效应模型

一、引言和文献评述

国际贸易理论向来强调贸易利得的来源，其中主要的来源之一便是要素在不同产业或部门间的转移配置。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要素从比较劣势部门向比较优势部门的转移，新贸易理论关注要素从不具有规模经济的行业向具有规模经济行业的转移。兴起于近年的异质性企业国际贸易理论(Melitz 2003)则将要素从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的转移视为贸易利得的来源之一。劳动力作为生产的主要投入要素，国际贸易如何影响劳动力要素的转移和配置自然成为决定贸易开放能否取得收益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成为贸易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关注的焦点话题。事实上，近年来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国际贸易对劳动力相关现象的影响，然而大多数文献着眼于贸易对劳动收入以及失业问题的研究(Helpman et al. 2011)，探讨国际贸易影响劳动力要素转移和配置的文献并不多。国际贸易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在导致某些产业规模扩大的同时缩小其他产业的规模，进而引致规模缩小产业的劳动力向规模扩大产业的转移，实现劳动力的重新配置。由此可见，在理论上国际贸易必然会对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配置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之所以该领域的研究较少是因为一方面缺乏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另一方面则缺乏阐述国际贸易影响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机制的动态框架。

Gaston 和 Trefler(1997)以及 Gourinchas(1999)较早地分别利用美国和法国的数据从国别案例角度研究了国际贸易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Konings 等(2003)则分析了贸易开放对转型国家产业间劳动力动态转移的影响，利用乌克兰的数据详细分析了转型国家与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Christev 等(2005)的研究在控制了其他劳动力特征变量后则发现国际贸易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并不大。而真正较为规范地分析国际贸易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文献应是 Wacziarg 和 Wallack(2004)的实证研究，他们首先构造了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在此基础上度量了跨国不同层次产业间的劳动力转移；进一步地，他们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开放不会影响一位数层面产业间的劳动力转移，但会对制造业内三位数

* 余官胜 温州大学商学院 邮政编码: 325035 电子信箱: yuguansheng@163.com。

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细分产业的劳动力转移产生显著的影响。

国外的实证研究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国际贸易对不同国家的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这说明了在关注国际贸易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影响的同时,必须同时考虑其他制度因素对该过程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会遇到各种阻碍,而主要的阻碍则来源于劳动力市场刚性,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存在会增加雇佣和解雇工人的成本,显然在外部冲击产生时会阻碍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Kambourov(2009)的研究规范地分析了当劳动力市场存在管制时,国际贸易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配置所产生的影响。他的模型在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框架内考察了国际贸易带来的外部冲击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并模拟了当劳动力市场管制程度不同时劳动力转移过程存在的差异。Kambourov 的研究发现智利由于同时进行了国际贸易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因此贸易开放明显加速了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而墨西哥则由于没有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而导致国际贸易开放并没有加速产业间劳动力转移配置。本文遵循 Kambourov(2009)的逻辑框架,旨在分析我国不同省份地区劳动力市场刚性存在差异时,贸易增长对三大产业间劳动力转移产生的不同影响。因而本文的理论研究意义在于能丰富国际贸易和劳动力要素配置的文献素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持续,国内学术界对劳动力问题的关注也日益增多,然而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研究集中于探讨区域劳动力转移或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和配置的分析并不多。成力为和孙玮(2007)对比分析了制造业外资和内资企业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发现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内资企业劳动力配置效率明显低于外资。程名望和史清华(2007)通过岭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能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而城市部门第三产业的发展则是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去向。王文举(2010)构造了三次产业间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模型,并分析了使经济系统收益最大化的产业间劳动力配置均衡条件。赵慧卿和郝枫(2010)基于对三次产业要素产出弹性的动态估计分析了我国劳动力配置效应及变化规律,表明产业间劳动力配置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黄国华(20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从农业向其他产业的转移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国内研究国际贸易和劳动力相关问题的文献也主要关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实证分析。王万山(2007)分析了开放经济背景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认为应从产业竞争优势的角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刘建民和高锐(2011)基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差异分析了民营企业出口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发现民营企业出口会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与本文最为接近的文献是马颖和余官胜(2010)的研究,他们在开放经济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中考察了贸易开放引致的劳动力转移对就业的影响,发现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较高时,贸易开放反而会减少就业;只有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较低时,贸易开放才能起到促进就业的作用。与马颖和余官胜(2010)的文献类似,本文也关注劳动力市场刚性背景下国际贸易对劳动力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本文的着眼点是贸易增长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此,在国内文献中,本文的研究对分析在何种条件下才能促使国际贸易有利于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贡献,能够更明确地探究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促使我国的国际贸易取得更大的收益。

本文在构建度量产业间劳动转移和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基础上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对我国省际 1996 - 2009 年贸易增长如何影响三大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进行实证研究。将劳动力市场刚性变量处理成门槛值,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只有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较低时,贸易增长才能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而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较高时,贸易增长反而不利于产业间劳动力转移,因而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符合 Kambourov(2009)的逻辑。由于本文在分析国际贸易的同时也关注劳动力市场现象,因此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能为我国的贸易政策和劳动政策提供借鉴。

本文的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回归方程构建和主要指标度量分析;第三部分为基本面板数据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回归模型设定和指标度量

本文旨在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当劳动力市场存在刚性时贸易增长对三大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此本文构建如下门槛效应回归模型:

$$RL_{it} = \eta_i + \alpha X_{it} + \beta_1 RT_{it} \times I(EL_{it} \leq \gamma) + \beta_2 RT_{it} \times I(EL_{it} > \gamma) + e_{it}$$

这里 RL_{it} 为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指标; RT_{it} 为贸易增长率; EL_{it} 为劳动力市场刚性指标; X_{it} 为其他解释变量; I 为指示变量,当括号内的不等式成立时取 1,不成立时则取 0; η_i 为地区变量, e_{it} 为回归残差,下标 i 和 t 分别

表示地区和年份。本文的样本包含 1996 – 2009 年间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样本数据 ,基于数据一致性的考虑 本文将重庆并入四川省内 ,新疆和西藏则由于缺乏部分数据而没有包含在本文的样本内。对于本文而言 ,需要度量的关键指标分别为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指标、劳动力市场刚性指标和贸易增长。

本文关注三大产业间的劳动力转移 ,而劳动力转移的结果体现在三大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的变化。因此本文遵循 Wacziarg 和 Wallack(2004) 以及 Kambourov(2009) 的方法 ,从劳动力占比的角度出发构建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指标:

$$RL_{it} = \frac{1}{2} \sum_{j=1}^3 S_{it}^j$$

这里 $S_{it}^j = |H_{it}^j - H_{it-1}^j|$ 为 j 产业劳动力占比变化量的绝对值 H_{it}^j 为 t 年 j 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 , $j=1\ 2\ 3$ 分别代表三大产业。该指标不仅能反映我国各省份地区的三大产业间劳动力转移 ,同时也能从劳动力结构的角

度衡量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化。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对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度量方面 ,由于劳动力市场刚性的来源有多种 ,因此度量方法也有多种。Forteza 和 Rama(2006) 详细分析了最低工资立法、劳动保险参与、工会组织以及政府部门劳动力占比等多种劳动力市场刚性来源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发现起显著作用的只有工会组织以及政府部门劳动力占比两个变量。具体到我国的情况 ,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存在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多元分割的现象(韩秀华、陈雪松 , 2008) ,而这种分割主要体现在体制编制内的劳动就业和体制外的劳动就业 ,体制内的劳动力雇佣和解雇的成本均较高 ,且具有较高的工会参与程度 ,因此刚性程度较高;而体制外的劳动力就业则较多遵循市场原则 ,刚性程度较低。基于此 ,本文使用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力占比以及工会会员占劳动力的比重两个变量度量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 ,分别用 ELP_{it} 和 ELS_{it} 表示。该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在贸易增长方面 ,为了全面反映出口和进口贸易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本文分别使用进出口贸易总量增长率、出口贸易增长率以及进口贸易增长率度量贸易增长 ,分别用 RT_{it} 、 RE_{it} 和 RM_{it} 表示 ,指标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表 1 归纳了我国各省份地区主要指标的基本信息。

表 1 各地区主要指标度量

地区	RL_{it}	ELP_{it}	ELS_{it}	RT_{it}	地区	RL_{it}	ELP_{it}	ELS_{it}	RT_{it}
北京	0.022 (0.019)	0.320 (0.148)	0.364 (0.045)	0.154 (0.215)	河南	0.020 (0.011)	0.084 (0.022)	0.137 (0.033)	0.157 (0.216)
天津	0.013 (0.012)	0.254 (0.077)	0.603 (0.116)	0.204 (0.137)	湖北	0.018 (0.009)	0.145 (0.040)	0.259 (0.079)	0.153 (0.189)
河北	0.017 (0.012)	0.117 (0.024)	0.203 (0.066)	0.172 (0.204)	湖南	0.016 (0.012)	0.093 (0.024)	0.171 (0.053)	0.136 (0.184)
山西	0.011 (0.008)	0.193 (0.033)	0.284 (0.093)	0.180 (0.319)	广东	0.017 (0.014)	0.100 (0.028)	0.220 (0.086)	0.141 (0.116)
内蒙古	0.013 (0.008)	0.190 (0.049)	0.319 (0.108)	0.163 (0.344)	广西	0.016 (0.015)	0.087 (0.018)	0.113 (0.030)	0.149 (0.267)
辽宁	0.015 (0.018)	0.202 (0.066)	0.433 (0.065)	0.128 (0.153)	海南	0.011 (0.005)	0.181 (0.045)	0.195 (0.019)	0.077 (0.231)
吉林	0.020 (0.015)	0.207 (0.056)	0.308 (0.056)	0.136 (0.235)	四川	0.020 (0.009)	0.082 (0.180)	0.147 (0.061)	0.182 (0.164)
黑龙江	0.017 (0.023)	0.245 (0.069)	0.328 (0.061)	0.168 (0.218)	贵州	0.021 (0.015)	0.077 (0.015)	0.106 (0.038)	0.126 (0.277)
上海	0.020 (0.008)	0.245 (0.092)	0.587 (0.114)	0.201 (0.173)	云南	0.015 (0.010)	0.088 (0.020)	0.098 (0.016)	0.114 (0.187)
江苏	0.020 (0.012)	0.100 (0.033)	0.227 (0.066)	0.256 (0.192)	陕西	0.015 (0.006)	0.146 (0.022)	0.188 (0.043)	0.128 (0.123)
浙江	0.022 (0.012)	0.071 (0.020)	0.217 (0.078)	0.391 (0.906)	甘肃	0.013 (0.017)	0.130 (0.026)	0.154 (0.031)	0.181 (0.298)
安徽	0.016 (0.007)	0.075 (0.021)	0.120 (0.029)	0.170 (0.165)	青海	0.021 (0.012)	0.160 (0.045)	0.203 (0.042)	0.143 (0.344)
福建	0.016 (0.008)	0.101 (0.058)	0.210 (0.058)	0.135 (0.116)	宁夏	0.018 (0.012)	0.163 (0.048)	0.207 (0.043)	0.158 (0.255)
江西	0.017 (0.009)	0.114 (0.026)	0.167 (0.516)	0.199 (0.241)	全国	0.017 (0.012)	0.146 (0.081)	0.242 (0.141)	0.167 (0.272)
山东	0.018 (0.014)	0.106 (0.024)	0.209 (0.075)	0.188 (0.147)					

注:表内数据为 1996 – 2009 年间均值 ,括号内为标准差。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三、门槛效应模型回归分析

由于本文分别使用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就业占比以及工会会员占比两个指标度量劳动力市场刚性,因此本文分别以这两个变量作为门槛值构建门槛效应回归模型,将其他经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本文将原先的门槛效应模型重写为:

RL_{it} = \eta_i + \alpha_1 RG_{it} + \alpha_2 RU_{it} + \alpha_3 IN_{it} + \alpha_4 G_{it} + \alpha_5 TH_{it} \tag{1}

+ \alpha_6 RT_{it} \times I(ELP_{it} \leq \gamma) + \alpha_7 RT_{it} \times I(ELP_{it} > \gamma) + e_{it}

RL_{it} = \varphi_i + \beta_1 RG_{it} + \beta_2 RU_{it} + \beta_3 IN_{it} + \beta_4 G_{it} + \beta_5 TH_{it} \tag{2}

+ \beta_6 RT_{it} \times I(ELS_{it} \leq \theta) + \beta_7 RT_{it} \times I(ELS_{it} > \theta) + \varepsilon_{it}

这里RG_{it}为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以反映经济增长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RU_{it}为就业率,由于城镇登记失业率的覆盖面过小,本文使用就业人员总数占经济活动人口数的比重度量就业率,以反映就业因素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影响;IN_{it}为投资率,用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度量,以反映投资因素产生的影响;G_{it}为人均实际GDP的对数值,用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TH_{it}为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用以反映就业结构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这些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Hansen(1999)构造的门槛效应模型回归方法与普通最小二乘法相比,其优势在于不仅能对系数进行估计,同时也能确定门槛值并对其显著性进行检验,且能构造门槛值的置信区间。

(一) 回归结果及解释

依照Hansen(1999)的门槛效果模型回归方法分别对方程(1)ELP_{it}门槛效应和方程(2)ELS_{it}门槛效应进行回归,得到表2和表3的结果。

表2 ELP_{it}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进出口贸易增长	出口贸易增长	进口贸易增长
RG_{it}	0.0246^{**} (2.210)	0.0210^{*} (1.8559)	0.0225^{**} (2.0238)
RU_{it}	0.0156 (0.146)	0.0205 (1.5344)	0.0180 (1.3142)
IN_{it}	0.0306^{***} (3.0821)	0.0311^{***} (3.1605)	0.0305^{***} (3.0300)
G_{it}	-0.0247^{***} (-3.9858)	-0.0255^{***} (-4.1380)	-0.0233^{***} (-3.7062)
TH_{it}	0.1112^{***} (3.8918)	0.1082^{***} (3.8414)	0.1085^{***} (3.7425)
RT_{it} \times I(ELP_{it} \leq \gamma)	0.0048^{*} (1.6572)	0.0142^{***} (3.0429)	0.0007 (0.5852)
RT_{it} \times I(ELP_{it} > \gamma)	-0.0137^{***} (-3.7341)	-0.0118^{***} (-3.6816)	-0.0066^{**} (-2.5693)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表3 ELS_{it}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进出口贸易增长	出口贸易增长	进口贸易增长
RG_{it}	0.0280^{**} (2.4607)	0.0308^{**} (2.6661)	0.0245^{**} (2.1484)
RU_{it}	0.0185 (1.3370)	0.0191 (1.3996)	0.0191 (1.3786)
IN_{it}	0.0261^{**} (2.5472)	0.0248^{**} (2.4332)	0.0319^{***} (3.1368)
G_{it}	-0.0204^{***} (-3.1830)	-0.0201^{***} (-3.1667)	-0.0225^{***} (-3.5450)
TH_{it}	0.0972^{***} (3.3266)	0.0951^{***} (3.2797)	0.1032^{***} (3.5415)
RT_{it} \times I(ELS_{it} \leq \theta)	0.0000 (0.0015)	0.0006 (0.1724)	-0.0003 (-0.2565)
RT_{it} \times I(ELS_{it} > \theta)	-0.0130^{**} (-2.4494)	-0.0140^{***} (-3.0162)	-0.0109^{*} (-1.6209)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从表 2 和表 3 的结果可以发现,在所有方程中 RG_{it} 的系数显著为正,即经济增长能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这是因为经济增长能加速人口流动,进而也能推动劳动力转移; RU_{it} 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就业水平的高低并不影响劳动力转移; IN_{it}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即高投资率能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这是因为投资能加速各种生产要素跨产业的流动; G_{it}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反映了人均实际 GDP 水平的提高会阻碍劳动力转移,说明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倾向于稳定的工作; TH_{it}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意味着第三产业就业从数占比的提高会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这是因为第三产业的就业较为灵活,更易于向其他产业转移。

在表 2 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占比门槛值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进出口贸易增长方程和出口贸易增长方程中 $RT_{it} \times I(ELP_{it} \leq \gamma)$ 的系数显著为正,进口贸易增长方程中 $RT_{it} \times I(ELP_{it} \leq \gamma)$ 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当以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占比度量的劳动力市场刚性小于门槛值时,进出口贸易增长和出口贸易增长能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而进口贸易增长则不会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产生影响。该结果验证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推论,即当劳动力市场不存在阻碍时,国际贸易能促进劳动力要素在行业部门间的优化配置,而该过程恰好是通过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来实现的。 $RT_{it} \times I(ELP_{it} > \gamma)$ 在三个方程中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了以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占比度量的劳动力市场刚性高于门槛值时,贸易增长反而会阻碍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这是因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冲击会改变不同产业的经济规模和劳动需求,然而由于劳动力市场刚性的阻碍无法实现劳动力的跨行业转移,因此与没有国际贸易时相比,这种外部冲击反而会不利于产业间劳动力转移。

在表 3 以工会会员占劳动力比重度量的劳动力市场刚性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在三个方程中 $RT_{it} \times I(ELS_{it} \leq \theta)$ 的系数均不显著,而 $RT_{it} \times I(ELS_{it} > \theta)$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该结论反映了当以工会会员占比作为劳动力市场刚性门槛值进行划分时,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较小时贸易增长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效果不明显;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较大时,贸易增长同样会阻碍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表 3 的结论同时也说明了在我国工会会员占比作为劳动力市场刚性门槛值的效果不如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占比,这是因为在我国对劳动力市场分割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体制内劳动就业和体制外劳动就业的区分,工会组织力量产生的影响仍不如劳动力市场分割明显。

(二) 门槛值检验

本文使用 Hansen(1999) 构建的自助抽样法(Bootstrap)对两个劳动力市场刚性指标的门槛值及其显著性进行检验,得到表 4 的结果:

表 4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门槛变量	门槛值	F 值	P 值	临界值 1%	5%	10%	95% 置信区间
ELP_{it}	0.1076	17.355	0.000	8.121	3.795	2.557	[0.0928 0.1177]
ELS_{it}	0.2689	5.3494	0.0260	6.577	3.934	2.415	[0.0916 0.5177]

表 4 反映了 ELP_{it} 门槛效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ELS_{it} 门槛效应则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均拒绝了模型不存在门槛效应的原假设,说明模型确实存在劳动力市场刚性门槛值效应。进一步地,表 4 确定了以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就业占比度量的劳动力市场刚性门槛值为 $\gamma = 0.1076$,95% 水平的置信区间为 0.0928 ~ 0.1177;以工会会员占总劳动就业比重度量的劳动力市场刚性门槛值为 $\theta = 0.2689$,95% 水平的置信区间为 0.0916 ~ 0.5177。

(三) 门槛值区域划分

本文可以以 ELP_{it} 和 ELS_{it} 指标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按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是否高于门槛值进行区域划分。表 5 依据 2009 年我国各地区的数据按两类门槛值将我国各地区划分为低劳动力市场刚性和高劳动力市场刚性区域。

按照本文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低于门槛值地区的贸易增长能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而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高于门槛值地区的贸易增长会阻碍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由于本文分别采用了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占比以及工会会员劳动占比两个指标作为劳动力市场刚性门槛值进行分析,因此在两个指标均小于门槛值的地区,贸易增长能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这些地区包括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和甘肃;而在两个指标均高于门槛值的地区,贸易增长会阻碍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这些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陕西、青海和宁夏;其他地区则取决于

两个门槛值指标效应的相对大小。从本文的区域划分可以发现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较高的地区平均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较低的地区,这说明了在我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也相应提高。

表 5 劳动力市场刚性门槛值区域划分

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占比(ELP_{it}) 门槛值	
低劳动力市场刚性地区	高劳动力市场刚性地区
河北、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	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海南、陕西、青海、宁夏
工会会员占劳动力比重(ELS_{it}) 门槛值	
低劳动力市场刚性地区	高劳动力市场刚性地区
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甘肃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陕西、青海、宁夏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产业间劳动力转移配置是国际贸易的主要收益来源之一,因此在何种条件下产业间劳动力能顺畅转移便成为了政策制定者和理论工作者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考察当劳动力市场存在刚性时,贸易增长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影响。分别利用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就业占比以及工会会员占劳动力的比重度量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本文在构建度量三大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低于门槛值时,贸易增长会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而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高于门槛值时,贸易增长会阻碍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这是因为贸易增长带来的冲击会改变不同产业的规模和劳动需求,当劳动力市场不存在阻碍时,贸易增长的这种效应会加速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但是当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大的阻碍时,贸易增长产生的这种冲击反而会造成劳动资源低效率配置,不利于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由此可见,本文的实证研究事实上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探明了在怎样的情况下贸易增长才能通过加速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而获取更大的贸易利得,具有较大的理论创新价值。

由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是基于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样本而得,并且同时关注贸易增长和劳动力市场刚性,因此本文的研究在国际贸易和劳动力市场领域存在多方面的政策借鉴意义。首先,由于本文的研究表明只有在恰当的条件下贸易增长才能获得贸易利得,表明了盲目采取贸易开放政策可能会致使经济遭受损失,因此我国各地方政府在推行外向的国际贸易政策时,应先审视本地区的经济条件是否适合推行贸易开放政策,即考察外部经济条件扭曲是否会导致贸易开放产生负面影响,尤其应考察劳动力市场条件,避免遭受不必要的贸易损失。其次,在本文的研究中,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过高是导致贸易利得减少的重要原因,因此各地方政府应着手降低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消除劳动力市场多元分割,在劳动力市场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灵活作用,通过减少行政干预、增加企业自主权等手段增强劳动力市场活力。最后,由于第三产业劳动就业的灵活性,本文的实证研究同时发现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占比的提高有利于产业间劳动力转移,因此为了加速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各地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人才倾斜等各种鼓励支持措施提高第三产业的经济份额。

参考文献:

1. 成力为、孙玮 2007 《我国制造业内外资资本与劳动力配置效率差异的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第 12 期。
2. 程名望、史清华 2007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基于中国 1978 - 2004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家》第 5 期。
3. 韩秀华、陈雪松 2008 《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当代经济科学》第 7 期。
4. 黄国华 2011 《非农产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的实证分析》,《西北人口》第 1 期。
5. 刘建民、高锐 2011 《民营出口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的实证研究》,《系统工程》第 1 期。
6. 马颖、余官胜 2010 《贸易开放、劳动力转移和就业》,《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 1 期。
7. 王万山 2007 《开放经济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 1 期。
8. 王文举 2010 《三次产业间资源优化配置均衡分析》,《经济经纬》第 2 期。
9. 赵慧卿、郝枫 2010 《中国农业劳动力配置效应再考察——基于三次产业劳动产出弹性动态估计》,《商业经济与管理》第 8 期。
(下转第 160 页)

54. Sieyès J. E. 1964. *What is the Third Estate?* New York: Praeger.
55. Spiller P. and S. Liao. 2006. "Buy, Lobby or Sue: Interest Groups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Making – A Selective Survey." NBER Working Paper 12209.
56. Stigler, G. J. 1971.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2(1) : 3 – 21.
56. Tullock, G. 1967.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General & Introduction Economics* 5(3) : 224 – 232.
57. White, H. C., S. A. Boorman, and R. Breiger. 1976. "Social Structure from Multiple Networks. I. Blockmodels of Roles and Pos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4) : 730 – 780.

Progresses of Inter – discipline Related to Regulatory Capture Theory

Li Jian^{1 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2: School of Managemen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Regulatory capture is a theory which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in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it introduces economics theory and analysis method to the objectives and outcome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which greatly expands the view of regulation stud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study on regulatory capture is a kind of inter – disciplinary, cross – border, cross – level research, and then is a new energetic field developed by crossing and integrating the regulatory capture with many related disciplines such as management, law,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in which the connotations, developments and new trends are expatiated.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refinements of these disciplines imply th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being on the regulatory capture around antecedents, types, affect, and governance aspect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 and shortcoming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we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 in further research for the principles of the integrity and ultimately develop to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theories.

Key Words: Regulatory Capture; Inter – discipline; Theory Research

JEL Classification: B250, K00, J51

(责任编辑: 彭爽)

(上接第 121 页)

10. Christev A., O. Kupets and H. Lehman. 2005.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Employment Effect in Ukraine."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1826.
11. Forteza J. and M. Rama. 2006. "Labor Market Rigidity and the Success of Economic Reforms Across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9(1) : 75 – 105.
12. Gaston N. and D. Trefler. 1997. "The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of the Canada – US Free Trade Agreement."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0(1) : 18 – 41.
13. Gourinchas, P. 1999. "Exchange Rates Do Matter: French Job Reallocation and Exchange Rate Turbulence, 1984 – 1992."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3) : 1279 – 1316.
14. Hansen B. 1999.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 – 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93(2) : 345 – 368.
15. Helpman E., O. Itzhoki and S. Redding. 2011. "Trade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NBER Working Papers 16662.
16. Kambourov, G. 2009.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s and the Sectoral Reallocation of Workers: The Case of Trade Reform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6(4) : 1321 – 1358.
17. Konings J., O. Kupets and H. Lehman. 2003. "Gross Job Flows in Ukraine." *Economic of Transition*, 11(1) : 321 – 356.
18. Melitz, M.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 – 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4) : 1695 – 1725.
19. Wacziarg R. and J. Wallack. 2004.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tersectoral Labor Move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4(2) : 411 – 439.

Trade Growth, Labor Market Rigidity and The Inter – industries Transfer of Labor Force: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Panel Data Threshold Effect Model

Yu Guansheng

(Business School, We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labor market rigidity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to determine whether international trade can promote inter – industries labor transfer. However, existing empirical studies have neglected the decisive role of labor market rigidity. In this paper, we build the indicators of labor market rigidity and inter – industries labor transfer based on foreign literatures and use panel data threshold effect model to research the diffident influence of trade growth on inter – industries labor transfer when there are diffidence of labor market rigidity. Our research find that when the value of labor market rigidity is below the threshold value, trade growth can accelerate the transfer of labor force between industries; when the value of labor market rigidity is above the threshold value, trade growth will hinder the transfer of labor force between industries. So we can get the conclusion that if we want China's trade growth to promote inter – industries transfer, we should first do reform in labor market and eliminate labor market rigidity.

Key Words: Trade Growth; Labor Market Rigidity; Inter – industries Labor Force Transfer; Threshold Effect Model

JEL Classification: F16, J60

(责任编辑: 孙永平、陈永清)